

上海圣约翰大学竞技体育小史（1890-1925）

高岛航

（京都大学）

- 原文刊载于[日]森時彦『長江流域社会の歴史景観』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現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2013年10月，303-345页。

序 言

西方近代竞技体育何时传入中国？又是怎样普及开来的？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体育史，也是考察近代化及文化交涉的重要且饶有兴趣的问题。但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旨在探讨的圣约翰大学，因是中国最早举办竞技运动会的学校而常被论者提及。定期的运动会和比赛是竞技体育扎根、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竞技体育黎明时期的圣约翰大学，其地位应与日本明治时期的第一高等学校相当，但其实际状况究竟如何，还几乎不为人所知。¹实际上，有关圣约翰大学的资料很丰富，对当时的竞技体育予以生动呈现是可能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准确再现当时中国竞技体育的原生态。

出于传统身体观念，竞技体育之于中国人本是极难理解的。关于中国人怎样接受竞技体育，请参阅本文姊妹篇〈“东亚病夫”与体育〉。²在该文中，笔者论述了圣约翰的教师向中国引进竞技体育，乃出于基督教化的目的而促进西化，但中国学生却试图通过竞技体育锻炼身体、强化纪律，以实现富国强兵、拯救国家，故二者实属同床异梦。而其背景，则是围绕由中西间非对称关系而产生的心理纠葛。因此，接受竞技体育，等于同时接受其背后的身体观乃至世界观。

作为前文的续篇，本文将具体探讨下一阶段，即竞技体育已无须寻求正当化，其本身就值得追求并逐渐发展的过程。第一节将就各竞技项目的引入和开展、在校内外形成组织的具体状况进行考察。第二节将探讨与竞技体育关系密切的军事训练和体育。第三节则将关注国旗事件后上海竞技体育界的重组，以及圣约翰的竞技体育在民族主义浪潮中遭遇的挫折。

此处首先就圣约翰大学及相关资料作一介绍。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开办的教会大学，建于1879年。初时称“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第一任校长是施约瑟(Samuel

¹ 王道杰等〈1890年圣约翰书院运动会史考〉(《体育文化导刊》，第103期，2011年1月)曾就1980年至2009年间的研究论文等提到的有关运动会的报道进行比较和探究，以呈现运动会的实际状况。但最终仍以〈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后述)为据(作者甚至未接触该“校史稿”)，可以说徒费功夫。就圣约翰的竞技体育作整体介绍的文章有黎宝骏〈圣约翰大学体育史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体坛先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黎在1920年代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1927年毕业)，并任篮球队领队，从第六届开始连续三次参加远东运动会。黎文以亲身经历为主，可信度较高，但关于1910年代以前，不少叙述并不准确。

² 拙稿〈“东亚病夫”与体育：从殖民地男性特质为视点的观察(「東亜病夫」とスポーツ：コロニアル マス キュリティの視点から)〉，石川禎浩等编《近代东亚的翻译概念(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訳概念の展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3年。

Isaac Joseph Shereschewsky)，第一年招生 39 名。书院位于远离上海中心的梵王渡（Jessfield），三面临苏州河。两年后，施约瑟患病，主要校务由中国牧师颜永京接任。1888 年，年方 24 岁的卜舛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就第二任校长，直至 1941 年。1892 年成立大学程度的正馆。修业年限，正馆为 3 年，中等教育程度的备馆（以下简称“中学部”）为 4 年。1895 年首届学生毕业，毕业生有胡浚康、曹福赓、吴任之。1905 年在美国完成注册，成为正式大学，校名也由圣约翰书院改称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下文除必须区分外，简称“圣约翰”）。1913 年始设研究生院。1936 年实行男女同学，1947 年在国民政府完成注册（此前一直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大学）。1952 年因所谓“院系调整”，不再使用“圣约翰”名，其旧址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学生数，1907 年大学 60 名、中学部 203 名；1910-1911 年度，大学 101 名、中学部 197 名；1915-1916 年度，大学 231 名、中学部 260 名。初期学生大多来自贫寒基督教徒家庭，1920 年其比例降至 20-25%，而商界富裕家庭的学生超过半数。³学费高昂，有“贵族学校”之名。

本文主要依据史料是《约翰声（St. John's Echo）》。该杂志于 1890 年 3 月在该校创刊，初为双月刊，1904 年秋改为月刊，后改为季刊。开始仅有英文版，1905 年增加中文版。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有该杂志英文版（创刊号至 1925 年）。中国国内收藏状况如下。华东师范大学：1893 年至 1937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1905 年至 1937 年；上海图书馆：1908 年至 1937 年。本文主要利用耶鲁大学收藏的英文版。但因时间有限，笔者只查阅了 1920 年以前刊行部分，以及 1921 年刊行的少部分。因此，本文主要考察 1920 年以前的圣约翰大学。这当然只是权宜之计，但基本涵盖圣约翰主导中国竞技体育的时期。因为，圣约翰竞技体育的相对优势自 1910 年代后半期已过巅峰。而象征着圣约翰在竞技体育界地位跌落的，是 1925 年的国旗事件。

近年来，学术界对圣约翰颇为关注，重要著作陆续问世。如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杨禾丰《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生活及其变迁（1920-1937 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组编、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等。不过，这些著作都属综合性研究，涉及竞技体育的并不多。

I. 竞技体育的发展

圣约翰系美国学校，故其竞技体育亦采美国式。以 1915 年至 1916 年赛季观之，第一场比赛是 10 月 2 日与金陵大学的棒球赛。10 月是棒球赛季，11 月至 12 月是足球赛季。篮球赛季是 3 月到 4 月，棒球和田径是 4 月至 5 月，网球是 5 月至 6 月初。即与日本不同，采赛季制。各项目赛季来临，首先通过选举产生队长并召集队员，然后举行预赛确定学校代表队的队员。其比赛日以周六为多，周日不比赛。圣约翰是教会学校，故需严格遵守基督教安息日。比赛对方多为教会学校，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下面就各竞技项目观察上述状况是怎样形成的。

³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Harvard University

1. 田径

有关圣约翰最早举行的运动会，撰于 1930 年的〈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是唯一资料。

一八九〇年五月二十日由李蔼门先生协助，学校有运动会之组织，在礼拜堂前举行。虽规模简陋，而学生之踊跃加入，精神殊为可敬。惟当时有人以为此种举动不甚雅观耳。此后定例，每年春秋举行二次。并施行相当训练。中国学校之有运动会，实以约大为嚆矢。关于此层，可观沈嗣良主任之详细报告。

这段文字写于运动会 40 年后，其可信度自然存疑。但 1891 年 7 月的《约翰声》也记载，“运动会每年春秋举行两次”，故大体无误。⁴如果第一次运动会是在 1890 年 5 月举行，则这段文字所记述的 1891 年的运动会应是第三次，且是第二次春季运动会。从每年两次已成定例考虑，1890 年春天曾举行运动会，应无疑义。

表 1 为 1891 年春季运动会的记录。这是最早的中国人竞技体育记录，十分珍贵，照录于后。⁵

表 1 1891 年春季运动会纪录一览表

	SHORT RUN (over 14 years.)		THREE LEGGED RACE (over 14 years.)
1st.	New China.	1st.	Loong San.
2nd.	Wae Tuk.		Yoon Tsung.
	(under 14 years.)	2nd.	Sih Sung.
1st.	Tsz Kwae.		Ching Foo.
2nd.	Mu Tz.		(under 14 years.)
		1st.	Tsz Kwae.
	HIGH JUMP		Yoon Kin.
1st.	New China	2nd.	Nion Zung.
2nd.	Kwae Sung.		Zau Ziang.
	LONG JUMP		LONGRACE (over 14 years.)
1st.	New China	1st.	Wae Tuk.
2nd.	Tz Kwae	2nd.	Yoon Tsung.
			(under 14 years.)
		1st.	Ve Hiang.
		2nd.	Ve Ching and Tsung Ziang.

出处: *SJE*, July 20, 1891.

Press, 1990, p. 66.

⁴ "Athletic Sports," *St. John's Echo*, July 20, 1891. *St. John's Echo* 以下注释略作“*SJE*”。

比赛项目有五，即短跑、跳高、跳远、二人绑腿跑和长跑。每项目参赛者分 14 岁以上和以下。表中仅记第一、二名，未录成绩，长短跑则连距离也不明确。另，表中姓名栏仅记名而未记姓，给人以家庭运动会的印象。不妨认为，田径比赛从“运动”走向“竞技”，即始于此。以下按时间顺序来观察运动会竞技化的状况。

最早的成绩记录始于 1893 年秋季运动会。这次运动会上，跳高成绩为 3 英尺 10 英寸（约 117cm），跳远为 11 英尺 3 英寸（约 343cm）。⁵这或许是中国人最早的田径成绩。时间记录始自 1895 年秋季运动会。这次运动会项目有短跑（75 码）、二人绑腿跑（75 码）、套袋跑、跨栏（75 码）、托土豆跑、跳远、长跑（150 码）、跳高。其中短跑成绩为 11 秒，长跑成绩为 22 秒。另外，此次运动会上首次比赛跨栏。⁷关于 1899 年 11 月 11 日举行的运动会，《约翰声》称，“整体上较前次有显著改善，证明学校不仅在精神上、宗教上，而且在身体上都取得了进步”，可看出已开始重视和追求记录。⁸

1900 年 6 月 9 日，圣约翰与南洋公学（校名屡次变更，下文统一作“南洋”）举行了校际对抗运动会。到南洋距离两英里，圣约翰的选手由顾斐德（Frederick C. Cooper）带领行进一小时，队伍中还有笛子、鼓组成的乐队。比赛上午十点开始，十一点半结束。观众里还有女性。项目有短跑（75 码）、投球、跳远、长跑（220 码）、二人绑腿跑（75 码）、跨栏、拔河。220 码的正式田径项目出现，值得关注。各项目第一、二名分获奖励 2 元和 1 元。圣约翰获胜，后来成为外交官的夏威夷华侨刁腓力获投球第一名。⁹除刁外，75 码短跑、220 码长跑第一名麦惠安、跨栏第一名郑肇桐也都是夏威夷华侨。夏威夷华侨为圣约翰带来美式竞技体育，对竞技体育的普及做出了贡献。¹⁰而在南洋，1897 年就任监督的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引进了军事训练、足球、棒球、网球等，1899 年冬，举行首次运动会。¹¹为参加此次校际运动会，学生们曾备战两三个星期。圣约翰的学生说，“再多给些练习时间，成绩肯定会更好”。学生们吃罢福开森招待的午餐，下午两点离开南洋。

⁵ “Athletic Sports,” *SJE*, July 20, 1891.

⁶ “Athletic Sports,” *SJE*, December 20, 1893.

⁷ Mong-en Tsu, “Athletic Sports,” *SJE*, December 20, 1895.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体育志》（上海体育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55页收有长辫学生跨栏的照片，并附说明“1890年圣约翰大学运动会跨栏比赛”，但准确性、真实性存疑。该照片在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体坛回眸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49页的说明是“清末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在上体育课时进行跨栏比赛”，在郎净著《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56页的说明是“1890年圣约翰大学运动会跨栏比赛”。另，《上海体育志》第162页载有长辫学生跳高的照片，说明为“1890年圣约翰大学运动会跳高比赛”，也值得怀疑。该照片也被有关体育的书籍屡屡转载。此类照片一般不注明出处，说明也不准确，使用时需特别注意。

⁸ “Athletic Sports,” *SJE*, February 20, 1900. “重视和追求记录”是竞技体育近代化的重要指标。请参阅古特曼（Allen Guttmann）著、谷川稔等译《竞技体育和帝国：近代竞技体育和文化帝国主义（スポーツと帝国：近代スポーツと文化帝国主義）》，昭和堂，1997年，第4页。

⁹ 刁成长在中国，十岁赴夏威夷，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外交部参事等职的刁作谦乃其弟。作谦也就读于圣约翰（1903年毕业于），曾作为网球选手代表中国参加过第五届（1921年）、第六届（1923年）远东运动会。

¹⁰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p. 162. 作为孙文曾在此就读而有名的奥阿胡学校（Oahu Collage，现普纳胡学校[Punahou School]）在 1887 年以前已开展田径运动，据记录最早的运动会在 1890 年 11 月举行。Dan Cisco, *Hawai'i Sports: History, Facts, &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p. 346.

¹¹ 福开森〈南洋公学早期历史〉，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 1 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3 页。前引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体坛回眸卷》第 46 页，及王华倬著《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36 页收有照片一帧，其说明为“上海南洋公学 1899 年举行的第一届校运会”。但照片背景上院大楼实际竣工于 1900 年春，该照片显然并非摄于 1899 年。

1902年秋季运动会始有撑杆跳和接力项目。¹²1903年的春季运动会上,75码短跑的记录是“8秒1/2”,可知已使用秒表。这比此前认为的早5年左右。¹³同年秋,短跑距离由75码改为100码。¹⁴1904年春,谭郇山的铅球投出28英尺10英寸,破“书院记录”。¹⁵同年11月17日举行第一届校际对抗田径运动会,参加者有圣约翰、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中西书院和南洋,总成绩分别为56、21、12、10分,圣约翰以压倒优势获第一名。当时的情形,朱友渔(1905年本科毕业,1907年获颁文学士学位)曾这样回忆说,

我读本科时,忙于大学运动比赛。……1904年,纽约州罗切斯特的圣保罗教会牧师孟嘉德来校任教授。他把撑杆跳、跨栏、链球等项目以及钉鞋等竞技运动的近代要素引进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是短跑、跳高、撑杆跳的大学记录保持者,但成绩并不太好,不久后就被低年级学生的更好成绩打破。我们神学班只有3名学生。谭郇山魁梧健壮,他的铅球和链球记录好几年没有被打破。¹⁶

孟嘉德(Arthur Sitgreaves Mann)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04年来圣约翰任哲学教员,1907年7月29日,因在庐山救助溺水友人而身亡。¹⁷孟嘉德在圣约翰任教仅两年多,但如朱友渔回忆,他把最先进的竞技体育带到了圣约翰。1905年入中学部的马约翰就当时的运动会这样回忆道,

从第一到第三名有奖品,个人冠军(获得分数最多的个人)被授予金牌。尽管这样奖励,但还是只有少数学生参加比赛和游戏。于是为了鼓励(运动),就提倡班级对抗游戏和比赛。这个做法很成功,第二年,学生们在运动场上练习得热火朝天。班长拼命动员班队进行练习。到运动会那天,好像整个学校都在争取年级第一。所有的教员都被动员来充任裁判。家长们都受到邀请,来看孩子们比赛。他们走进获胜的儿子身边时,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自豪和爱情。¹⁸

为鼓励田径运动,还采取过其他措施。比如,巴顿(H.B.Barton)为中学部年级对抗竞赛的优胜队颁发过圣·乔治杯。马约翰则约定,谁打破自己一英里长跑记录,就把奖牌赠给谁。¹⁹比赛记录还被做成匾额,挂在1904年落成的思颜堂二楼礼堂里。²⁰

¹² “Athletic Sports,” *SJE*, February 20, 1902.

¹³ “The Spring Sports,” *SJE*, August, 1903; Wu Chih-kang, “The Influence of the YMCA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56. Wu Chih-kang称, 1908年在天津举行的第6届联合运动会首次使用秒表。

¹⁴ “Athletic Sports,” *SJE*, December 20, 1903..

¹⁵ “Field Day,” *SJE*, August 20, 1904.

¹⁶ 据Andrew Y. Y. Tsu[朱友渔], *Friend of Fishermen*, Trinity Press, 1951, p. 13. *SJE*记载, 朱在1904年秋季、1905年春季校运动会上曾获总分第一名。

¹⁷ 1909年, 在圣约翰校内建起了用他的名字命名思孟堂(Mann Hall)。

¹⁸ John Mo[马约翰], “My Fourteen Years Experience of Western Physical Education,” report submitted to International YMCA College, 1920, p. 12.

¹⁹ A Member of the Cliosopic Club, “The Preparatory Field and Track Meet,” *SJE*, December, 1912; “St. John’s in the Local Chinese Amateur Athletic Meeting,” *SJE*, June, 1913. 据陈鹤琴回忆, 巴顿是教拉丁语的老师, 学生似乎很怕他。前引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组编、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 第208页。

²⁰ 前引黎宝骏《圣约翰大学体育史略》。“New Athletic Record Board,” *SJE*, January, 1913.

南洋逐步追赶上来。1906年11月16日举行的第三届大学对抗赛的成绩为，圣约翰36分，南洋30分，中西书院18分，东吴大学5分；圣约翰勉强获胜。²¹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First Chinese National Athletic Sports）”在南京举行（后被承认为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其组织、运作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下文简称“青年会”）有关人承担，参加选手来自上海的有40人，另有苏州和南京选手31人、武汉28人、华南28人、华北20人。比赛分地区对抗赛（高等组和中等组）和学校对抗赛。在高等组地区对抗赛中，上海获得99分中的52分，以压倒优势夺冠。学校对抗赛中，圣约翰和南洋为争夺冠军而激烈竞争，直到最后的880码接力才分出胜负。结果圣约翰以总成绩37分获得冠军，南洋以总成绩34分屈居亚军，第三名是天津的普通中学堂（YMCA, Tientsin），总成绩为10分。²²

1913年2月，远东奥运会在马尼拉举行，中国约有40名选手参加。其中圣约翰的学生有3名，即韦宪章、韦焕章、李茂祥；另外，上海青年会的高恩养、清华学校的黄纯道和潘文炳，也都曾就读于圣约翰。在这次运动会上，韦焕章获跳远、120码跨栏冠军和220码长跑亚军。中国田径获总分36分，其中仅圣约翰学生就获得26分。²³

同年春季运动会始设铁饼项目，而120码跨栏则由低栏改为高栏。这都是采用远东奥运会的标准。亦即，参加国际大会促进了标准化。韦焕章的220码跨栏成绩为27秒4/5，比“远东奥运会记录还好”（远东奥运会记录是菲律宾选手罗萨达的28秒3/5）。就这样，运动会已不仅是校内活动，而且被纳入了以远东奥运会为顶峰的竞赛体系中。不过，学校外的田径比赛渐次正规后，校内运动会作为竞技大会的意义则相对降低。

1914年5月9日，圣约翰参加江湾的公开竞赛大会，其440码接力以微弱优势战胜号称上海最强的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美国连队。万国商团对此异常惊讶，同时也称赞圣约翰获胜。因队长韦焕章脚伤未能上场，圣约翰没能获得冠军，但其实力得到外国人一致认可。²⁴

第二次远东运动会（由“远东奥运会”改名而来）预定于1915年5月在当地上海举行。圣约翰于4月24日举行运动会，成绩优秀的选手则参加华东六大学体育联合会主办、于5月1日举行的第二次华东大学对抗比赛（即“六大校联合运动”）。圣约翰以总成绩33分获得冠军，比亚军南洋的总成绩高出15分。²⁵这次大会上成绩优异的选手获得参加远东运动会的资格（未进行全国预选）。从《进步杂志》载中国代表名单推断，如下选手似为圣约翰的学生：冯建维、韦焕章、杨锦辉、姚醒黄（姚星娘）、姚福仁、谢国华、姚麟书、林语堂、林祖光、余衡之、董选青、李迪云、杨德宝、袁根初、谭瑞文等。²⁶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林语堂曾

²¹ "Athletic Activities," *SJE*, February, 1907.

²² "National Athletic Meet at Nanking," *SJE*, December, 1910. 有关这次大会的详情，请参阅Andrew Morris, "To Make the Four Hundred Million Move: The Late Qing Dynasty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2, No. 4, October, 2000. 另，拙稿〈远东运动会与基督教青年会（極東選手権競技大会とYMCA）〉（夫马进编《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则从青年会角度论述了这次大会的意义。

²³ Wei Hwen Tsang [韦焕章], "China in the First Far Eastern Olympic Games," *SJE*, February, 1913.

²⁴ T. K. Sung [沈志高], "A Letter from the Relay Team of the American Company, S. V. C.," *SJE*, June, 1914; K. B. Young [杨锦辉], "The Kiangwan Open Meet," *SJE*, June, 1914.

²⁵ Kenneth B. Young [杨锦辉], "Intercollegiate Meet," *SJE*, June, 1915.

²⁶ 关于早期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选手，尚未见较为可信的名单。《进步杂志》（第8卷第3号，1915年6月）载名单主要为英语，故并非所有选手汉字名字都可确定。另，该名单所载选手是否确曾参加大会亦不得而

这样追忆道，

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²⁷

学校当局和学生父亲的态度既然相反，令人印象深刻。从整个社会看，人们还是不太理解竞技体育的意义。《约翰声》载，林语堂曾在学校运动会上跑出 5 分 29 秒的记录（远东运动会上，郭毓彬以 4 分 50 秒 4/5 获冠军）。观诸以前记录，名 Zi Tsing-ming 的学生曾在 1913 年的校外大会上创造过 5 分 19 秒 1/5 的记录。也就是说，林的记录应是校内运动会的新记录。总之，圣约翰有不少学生参加了远东运动会，但那是因为比赛在上海举行。实际上，圣约翰在中国代表选手中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

其一，南人之体育，较逊于北人。如此次运动中，田赛屡列首名之李如松[协和]、郭毓彬[南开]、黄文道[清华]、吉子英[汇文]、凌达扬[清华]诸君，均北人也。其二，中国自办学校体育之成绩，较逊于外人所办者。如此次运动占优胜之北京汇文(得十二分)、天津南开(得八分)、北京清华(得九分)、通州协和(得六分)、苏州东吴(得五分)、上海约翰(得七分)诸校，均系外人所办，而得与上列诸校并驾齐驱者，仅一上海之南洋公学。²⁸

而 1917 年 4 月 21 日则是“常胜军”(Ever Victorious Team)覆灭的日子。

圣约翰比赛史上最令人伤心的，是选手在华东大学田径对抗赛上没能拿到冠军旗的时候。……我们终于同意把康乃尔杯借给南洋保管一年。借期到时，我们要让他们加倍偿还。²⁹

但是，康乃尔杯没能马上回来。南洋连续三年获得冠军。1920 年，原计划在 5 月 15 日举行的运动会因学生罢课而被取消。³⁰1921 年则是复旦获胜，圣约翰和南洋轮流称雄的局面首次被打破，上海田径竞技迎来崭新时代。圣约翰在 1925 年夺回冠军，但随后即发生了国旗事件。

最后，从记录方面对圣约翰竞技体育的发展状况作一概观。表 2 为 1893 年至 1921 年间校内运动会的跳远成绩。以三十年的时间跨度看，成绩显然一直在提高。仔细观察可见，成绩下降发生在辛亥革命后和 1917 年。前者带来了竞技体育运作体制的改革(请参阅第 320

知。

²⁷ 林语堂〈八十自述〉，《林语堂名著全集》，第 10 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70 页。引文中“根耐斯”即“Kenneth B. Young，杨锦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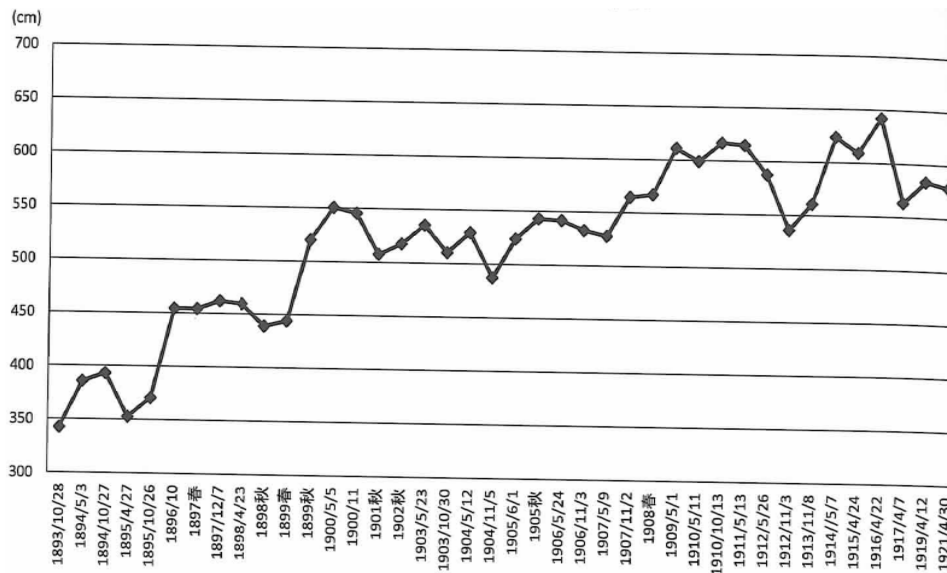
²⁸ 〈远东运动会余谈（遠東運動會余談）〉，《时事新报》，1915 年 5 月 25 日。

²⁹ David W. K. Eu [欧伟国]，“The East China Intercollegiate Meet,” *SJE*, May, 1917.

³⁰ Z. P. Daung [唐树屏]，“Field and Track,” *SJE*, June, 1920.

页)。1917年成绩下降的原因不明，但该年是“常胜军”败给南洋并陷入低迷的年份。³¹

表2 校内运动会跳远纪录



出处: *SJE*, July 20, 1891.

2. 棒球

1872年至1875年，清朝派12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在哈特福德（Hartford）学习的梁敦彦、詹天佑、蔡绍基等于1876年组织了中华棒球队（Oriental Baseball Club）。其中，左撇子梁丕旭（梁诚）曾是安多弗学院（Phillips Andover Academy）和耶鲁大学的投手。1881年，留美幼童因濡染西方文化过深，未完成学业即被召回国。途中，中华棒球队曾在奥克兰市与当地球队进行比赛并获胜，故其实力似不容小觑。³²回国后，他们没有机会打球，但1890年代曾与美国水兵比赛一次，双方以二比二战平。³³

中国人打棒球始自何时？一般看法是，北京汇文书院于1895年招聘留美归来的曹泳归医生业余指导棒球。同年，圣约翰有来自檀香山的华侨学生麦惠安、杨锦魁、刁腓力、邱道生等传来棒球，通州的协和书院也有开展。³⁴上述说法都认为棒球始于1895年。

圣约翰曾在1891年6月6日与西童男校（Public School for Boys）进行棒球比赛，以23比38落败；据称，这是“我们与英国少年进行的第一场比赛”。³⁵1895年毕业于圣约翰的颜惠庆曾回忆当时棒球运动的情形说，

³¹ 当然，并非所有项目此后都陷入低迷。比如投掷项目的成绩仍在逐年提高。

³² Thomas E.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3-54, 124.

³³ Hui-ch'ing Yen [颜惠庆], *East-West Kaleidoscope, 1877-1946: An Autobiography*,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7.

³⁴ 陈湿明等著《中国棒球运动史》，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8页。陈湿明〈棒球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与早期发展〉，《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17卷第2期，1991年。崔乐泉著《中国近代体育史话》，中华书局，1998年，第227页等。均依据不明。

³⁵ "Baseball," *SJE*, July 20, 1891.

我们几个人打棒球很原始，既没有手套，也没有护面，更没有其他防护用具，球是自制的，使用简易球棒，球场也不标准。比赛或多或少遵守棒球规则，但最大乐趣是有机会把球投向跑垒者。投中了，跑垒的就算出局。一次，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我正在跑垒，打得很重，还昏迷了几分钟，其他选手非常担心。³⁶

不久，棒球成为圣约翰的主要竞技项目，扩建了场地，置办了用具和设备。他们寻找机会一试身手，终于在1903年6月接受了上海棒球俱乐部（Shanghai Baseball Club）的挑战，结果是以3比22大败。³⁷他们下一个对手是东亚同文书院，比赛在1904年5月7日举行。东亚同文书院的记载如下。

新绿滴翠，游兴勃发，彼飞檄于我，欲一决棒球高下。彼有宽阔场地与完善器具，球技千磨百炼，声威势壮，言下如称：汝日人莫以战争胜敌而迷醉，试看能敌我否！直如胜券在握。我则相反，既无适当球场，器具类亦不值一提，仅好此道者散漫弄球嬉戏而已。然接挑战而返顾，乃迎朝霞做花泥之大和武夫所不为，纵难以折桂戴冠，唯以勿球技露拙贻笑敌手为望矣。乃允诺。赛期之先，队长犬饲、石田及选手三隅三人会敌方队长于南洋公学，商量赛事。五月七日午后，我选手并石田、犬饲、森田三人赴 St. John's College 后庭面敌。此战我已七分不利。且彼外人助威甚壮。此战胜负不独直接影响当地日人，且将传诸本国，选手苦心当可察也。本校学生大部前往助威。裁判乃敌方干事 Walker 充之。³⁸

这是一篇语势雄壮的文章。铃木康史在论述第一高等学校运动部与文艺部的对立时注意到运动部的言论常见“壮”字，指出这是“悲愤慷慨”的汉文体与国家、勤俭尚武、质朴刚健等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而它们被所谓大正教养派通过言文一致的文体内化到精神世界时，转化成了抒发个性、悲哀烦闷、闲雅从容等价值观。在此过程中，政治性、暴力性的壮士变化为非政治性的健全主体，而为学校、为国家的“比赛”亦随之转化成为自己的“竞技”。³⁹换言之，竞技体育与文体存在密切关系。东亚同文书院的上述文章也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章明确显示选手们是为日本而比赛。相比之下，圣约翰方面的记载显得极其平淡，毫无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气息。如果相信东亚同文书院的记载，则圣约翰的学生也是带着民族主义感情面对此次比赛的。果真如此，则《约翰声》报道时对此只字不提，是英语能力不足以表达，还是有意抑制，抑或仅是落败后不便详述？不过，这是《约翰声》报道比赛时的普遍倾向，恐怕是有意避而不提，以免刺激民族矛盾。其意义留待后述。铃木的论述是否或多大程度上适合中国还有待探讨；但在考察文体以前，中国至少还有语言问题，这与日本大不相同。总之，这场双方都全力以赴的比赛，以圣约翰2比21大败而结束。比赛中，圣约翰防守中场的是马约翰。

对校外的首场胜利，是5月28日对南洋的比赛，圣约翰以47比6大胜而归。⁴⁰和东亚同文书

³⁶ Hui-ch'ing Yen, *op. cit.*, p. 8.

³⁷ "Base-ball Match," *SJE*, August 20, 1903.

³⁸ 〈本学院对 St. John's College 棒球赛〉，东亚同文书院学友会编《会报》，第1号，1904年8月。

³⁹ 铃木康史〈第一高等学校的“壮”（第一高等学校における「壮」的なるもの）〉，中村敏雄编《日本人与竞技体育的相互适应性（日本人とスポーツの相性）》，创文企画，2002年。

⁴⁰ N. L. Nien, "Base-ball Matches," *SJE*, June 20, 1904; "Baseball Matches," *SJE*, August 20, 1904.

院后来又赛过几场，圣约翰都以微弱差距不敌对手：1905年6月是11比13，1906年5月是2比3。⁴¹东亚同文书院编《会报》记载，后来6月26日与圣约翰再次比赛，“大获全胜，细节无详述价值，略”。次年5月20日还在广东街练兵场比赛过（战绩不详）。但《约翰声》1906年12月号报道称，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比赛中，日本方面对裁判提出异议，放弃比赛，成绩则圣约翰以9比0取胜。⁴²这是两校最后一次比赛。

1907年以后，校内似仍有少数人在打棒球，但未能组织正式代表队。1909年的《约翰声》谈到棒球项目衰落时说，“美国最吸引人的竞技项目棒球，正逐渐失去魅力”。最主要问题是没有什么比赛对手。中国学校几乎都没有棒球队，而与外国人比赛，长辫又是障碍。因为，留长辫者是禁止进入赛马场（比赛场地）的。1911年初，圣约翰300多名学生中，剪辫者仅20%左右。辛亥革命后的1911年12月，有150名学生剪掉发辫，教员也几乎都挥别了长辫这个“服从、古旧、萎靡”的象征（图1）。⁴³

稍前的1911年9月16日，圣约翰终于得到对外比赛的机会。对手是上海棒球联赛的优胜队，有6名选手来自联赛冠军红袜队。比赛能够回避发辫问题而得以实现，乃因圣约翰的教员、也是上海联赛选手施达格（George Nye Steiger）及巴顿等人斡旋。圣约翰的捕球手是施达格，游击手是巴顿，中国学生也有高恩养、杨锦辉等五名上场。从名字推断，这些学生除高恩养外，似乎都是夏威夷华侨。虽然圣约翰在第九局上半场被赶超，仍可谓旗鼓相当。⁴⁴



图1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学校田径对抗赛冠军圣约翰队队员合影。数名队员已剪短发
（出处：SJE, January, 1911.）

1913年春，巴顿曾尝试重新引进棒球，未获成功。因为，远东奥运会前后重要的田径赛事不断，而球技选手又几乎都是田径选手。1914年秋，圣约翰与沪江大学（Shanghai

⁴¹ “Baseball Matches,” SJE, August, 1905; “A Baseball Match,” SJE, August, 1906.

⁴² 东亚同文书院校友会编《会报》，第4号，1906年4月。“Base Ball Game,” SJE, December, 1906.

⁴³ “The Queue,” SJE, January, 1911; “Base-ball Game,” SJE, October, 1911; “Students Cutting Their Queues,” SJE, December, 1911. 在南洋，校长唐文治提倡剪辫，1911年11月9日在运动场举行“剪辫大会”，全体教职员和所有学生都剪掉了发辫。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⁴⁴ “St. John’s vs. Shanghai,” SJE, October, 1911. 施达格后来成为亚洲史教授，著有 *China and the Occident: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7.（日译本：藤冈喜久男译《義和団：中国とヨーロッパ》，桃源社，1967年）。

Baptist College) 进行过一场比赛, 以 39 比 3 获胜。⁴⁵1915 年 1 月的《约翰声》报道棒球正在复活, 并说, “美国人创办的学校里完全看不到美国的国技, 有些不可思议”。1916 年 5 月再次报道称, 棒球重获人们喜爱, 学生们一到下午就进行练习。有学生说, 如“牺牲短打”所显示, 打棒球可以克服个人主义, 养成合作精神, 也能获得忍耐等道德教训, 对以后的人生大有益处。但要打好棒球需要长时间练习。⁴⁶总之, 在圣约翰乃至中国, 棒球都没能成功扩大其影响。⁴⁷

3. 网球

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很早就打网球, 但中国人何时开始打网球则不得其详。《中国近代体育史话》称, 1885 年前后, 北京的汇文、通州的协和、上海的圣约翰、广州的岭南、香港的教会学校等开始有网球运动。⁴⁸

《约翰声》自 1892 年开始提到网球。学生们开始学习网球, 每天一到下午就练习。⁴⁹网球在圣约翰从来都是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⁵⁰两腿发软踢不了足球, 视力不好, 打不了棒球, 但是这些书蛀虫们玩起网球来, 却可以不必在意长衫和指甲。⁵¹网和球都由学校提供, 丢失则需学生自己赔偿。足球、棒球也一样, 球衣、球鞋都由学校购置。⁵²1913 年以后, 学生开始自备球拍。到 1919 年, 半数以上学生都有球拍, 学校有 20 面网球场, 仍难以满足学生们的需要。⁵³

1898 年设立的斯坦豪斯杯(授予校内网球比赛冠军)为促进学生们提高水平发挥了作用。首位捧得此杯的是刁腓力。⁵⁴第一次对外比赛是在 1907 年 5 月 29 日, 对方是东吴大学。⁵⁵1910 年 10 月举行的所谓最早的全国运动会上, 进入网球半决赛的潘文炳、许耀光、马约翰、林全诚四人, 全部是圣约翰的学生, 经协商不再继续比赛(其他比赛仍须参加)。⁵⁶在大学对抗赛中, 圣约翰也几乎全部夺冠。

4. 足球

中国人踢足球始于何时, 有几种说法。《中国近代体育史话》将 1880 年代香港快乐村官立小学学生模仿英国人踢足球, 视作中国人足球运动之始。《中国体育史话》记述稍详, 认为上述香港小学生仿嬉足球是在 1890 年代, 而官立学校则是“育才”和“王宁中”。⁵⁷二书均未注

⁴⁵ “Baseball,” *SJE*, November, 1915.

⁴⁶ F. L. H. P. [Francis L. H. Pott], “Editorial,” *SJE*, January, 1915.

⁴⁷ 在美国殖民地菲律宾, 棒球引进当初很受欢迎, 但 1920 年代后就极少有人问津; 而在日本及其殖民地台湾、朝鲜, 棒球依然很有影响。现在, 台湾、韩国的棒球很兴盛, 北朝鲜则反之。竞技体育的传播和普及、盛衰,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⁴⁸ 前引崔乐泉著《中国近代体育史话》, 第 223 页。罗时铭等主编《中国体育通史》, 第 4 卷(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年)第 359 页, 也有同样记述, 但均未注明依据。

⁴⁹ Untitled document, *SJE*, July 20, 1892.

⁵⁰ “Tennis Tournaments,” *SJE*, August, 1909; Z. P. Daung, “Athletic News,” *SJE*, November, 1919.

⁵¹ K. C. Tsar, “Tennis Tournaments,” *SJE*, August, 1908.

⁵² John Mo, *op. cit.*, p. 13.

⁵³ “Auction of Tennis Rackets,” *SJE*, May, 1913; Z. Y. Ling, “Tennis,” *SJE*, May, 1919.

⁵⁴ “Tennis Tournament,” *SJE*, December 20, 1898.

⁵⁵ Z. Z. Kwei [归润痒], “The Inter-collegiate Tennis Tournament,” *SJE*, August, 1907.

⁵⁶ Yang Zung-sung [杨润生], “National Athletic Meet at Nanking,” *SJE*, December, 1910.

⁵⁷ 前引崔乐泉著《中国近代体育史话》, 第 209 页。前引罗时铭等主编《中国体育通史》, 第 4 卷, 第 346 页。二书均称, 在华北, 1900 年以前, 协和书院已有足球运动, 但同样未注明依据。

明依据何在，但足球是香港人受喜爱足球的英国人影响而早有仿行，应为不虚。关于香港，管见所及，较为可信的资料为香港皇仁书院的校内杂志《黄龙报》1900年4月号。⁵⁸该校有三支六人制足球队，其中之一可见“Choi Chan Fan”，似为中国人名。到1904年，则有中国人球队诞生。⁵⁹

在上海，一般认为圣约翰在1901年组织了足球队，但据《约翰声》记载，该校足球运动始于1896年。

学生们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娱乐方式。Foot Ball已经举行过几次，但还没有正式俱乐部成立。⁶⁰

《中国的足球摇篮》称，1895年，麦惠安、杨锦魁、刁腓力、邱道生等来自檀香山的华侨学生，使田径、足球正规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于次年选拔队员，成立了足球队。⁶¹此说也未注明依据，真假难辨。不过，三年后，“棒球、门球（Croquet）、足球”已成冬日游戏项目，显示足球已在圣约翰扎根。1898年夏，校内成立竞技比赛团体，足球即其中之一。⁶²

首次对外比赛是在1902年11月，其成绩，对Dockyard Engineers为0比3，对Shanghai Rangers为3比4，皆不敌对方。11月16日对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School），被视为双方均为中国人的首次比赛，圣约翰以4比1第一次战胜校外对手。⁶³

与最主要对手南洋的首次比赛，一般认为是在1903年。如《交通大学校史》解释道，“1903年首次与圣约翰大学球队比赛，结果失利。1904年与圣约翰队再次较量，本校又败北。两次失利，引起了学校对足球运动的重视，成立了足球部”。⁶⁴另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称首次比赛比分为1比7。⁶⁵据《约翰声》记载，首次比赛的日期是1904年1月1日（阴历1903年11月14日），圣约翰3比0获胜。⁶⁶而且，与南洋对阵的是“second team”，即圣约翰的替补队。1905年冬天与南洋一战比分为7比1，《上海交通大学纪事》或将此误作首次比赛。当时就读于南洋的蒋梦麟曾回忆道，南洋公学中学部接受福开森建议，管理和运作仿行美国高中。还说，

大学按西方设计配置和建设，总部中央有钟楼，几英里外即可看到。不少建筑物前有宽阔的足球场，绿茵茵的草皮修剪齐整。学校当局鼓励足球和棒球，学生一般都热衷比赛。大学田径对抗赛每年举行两次，数千观众前来观看。⁶⁷

南洋实力提高很快，1908年3月21日的比赛以1比1战平圣约翰。一年后的3月27日，圣约翰对南洋以0比6惨败，尽管“此前我们无论哪方面，不，在所有方面都曾经易取

⁵⁸ “School Notes,” *Yellow Dragon*, Vol. 1, No. 8, April, 1900.

⁵⁹ 该俱乐部于1908年改称“南华足球会”，后经几番离合，1920年改称“南华体育会”，至今。

⁶⁰ “News Column,” *SJE*, February 20, 1896.

⁶¹ 沈文彬主编《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页。

⁶² “Athletic Associations,” *SJE*, August 20, 1898; “Foot-ball Matches,” *SJE*, February 20, 1902.

⁶³ “Foot-ball Matches,” *SJE*, February 20, 1902.

⁶⁴ 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编《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

⁶⁵ 前引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上卷，第43页。

⁶⁶ “Foot Ball,” *SJE*, February 20, 1904.

⁶⁷ Chiang Monlin [蒋梦麟], *Tides from the West*, China Culture Publishing Foundation, 1957, p. 61.

胜”。圣约翰方面辩称，那是因为赛前只练习过两次。⁶⁸当时就读于圣约翰的马约翰说，

足球意味着逮着球就踢。正式比赛是学生们难以理解的。能把球踢到四、五十英尺高，大家就认为了不起，会得到学友们赞赏。⁶⁹

从这段文字推断，圣约翰足球的技术并不成熟。不过，马约翰说，中国学生由于从小就玩传统游戏踢毽子，所以脚下功夫很出色。⁷⁰在战前东亚的竞技体育界，中国足球表现出压倒性优势，其原因或即在此。

圣约翰和南洋交战，宛如“美国的哈佛对耶鲁那样的大型赛事”。圣约翰学生说，“在我们的球场打败南洋算不得什么，在他们的球场胜他们，才是最大喜悦”。可见两校都有极强的竞争意识。⁷¹

一次，比赛在南洋举行，圣约翰 3 比 1 获胜。赛场上的学生，圣约翰方面约 600 人，南洋约 800 人，还有其他观众数千人。圣约翰学生高兴之余高声揶揄对方，导致两校学生互殴。圣约翰的队员身处险境，不得不叫警察前来保护。南洋有两名教员是圣约翰的毕业生，第二天来上课时，学生们把他们的车子彻底砸坏，吓得他们只好躲进校长室，等天黑才由校长陪着离开学校。马约翰将此作为学校精神的负面事例，称外国教员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的竞技体育精神。⁷²

1910 年以后，在实力上，南洋基本上一直占优。在 1914-1915 年度开始的华东六大学体育联合会主办的锦标赛上，至 1920-1921 年度，圣约翰只有 1917-1918 年度和 1920-1921 年两次取胜，其他则全都败给了南洋。

该赛事 1920-1921 年度的最后比赛，于 1920 年 12 月 22 日（周三）在麦根路的沪宁铁路体育场举行。圣约翰和南洋每赛季各在主客场比赛一次，若结果一胜一负，则在该体育场再赛一场，以期公平。这次是 1915 年以来的第二次。现场约有七千名观众，下午 3 点开球。上半场结束前五分钟，圣约翰的队长严寿康踢进一球。下半场，圣约翰进攻时，南洋要求比赛暂停，未获许可，圣约翰的孟庆征再进一球。南洋提出抗议，被外国裁判驳回。其后南洋进一球，最终圣约翰以 2 比 1 获胜。随后，圣约翰队在大东旅社摆开庆功宴，又乘车在市内游行后回到学校。学校里，早有人打着灯笼列队欢迎。当时在欢迎队伍中的苏公隽直至七十多年后还回忆说，他们走到平时不得靠近的姊妹校圣玛丽亚学院正门前时，隐约看到聚集在二楼的女生在拍手欢呼，感到自己就像凯旋而归的罗马战士。⁷³之后又围着篝火进行讲演、喝彩，唱过校歌才作罢。⁷⁴其情景直如日本旧制高中的狂欢（storm）。

5. 篮球

与其他竞技体育项目不同，篮球引入中国的过程十分清楚。篮球是 1891 年创制的新项

⁶⁸ 这也是圣约翰的学生与推崇艰苦训练、自我克制力极强的日本学生的不同之处。

⁶⁹ John Mo, *op. cit.*, pp. 2-3.

⁷⁰ 同样说法，也见于 *Ibid.*, p. 13.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39.

⁷¹ K. T. Tsoong, "Football Matches," *SJE*, January, 1915; "Football," *SJE*, January, 1918.

⁷² John Mo, *op. cit.*, p. 21.

⁷³ 苏公隽〈我所了解的圣约翰大学〉，《纵横》，第 83 期，1996 年 11 月。

⁷⁴ C. H. Tau [刁庆欢]，"Football," *SJE*, December, 1920.刁曾作为篮球选手参加 1923 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

目，致力于推广的也是其创制者基督教青年会。天津青年会的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曾在 1895 年 12 月 8 日该会成立仪式前后示范过篮球，这也被视作有关中国篮球的最早记载。据确认，中国人最早举行的篮球赛，是在 1896 年 3 月 28 日。⁷⁵在上海，则是 1908 年来华的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晏士纳（Max J. Exner）曾致力于普及篮球。⁷⁶篮球虽未被列入 1910 年举行的全国运动会正式项目，但华北、上海、吴宁（苏州和南京）三队曾进行公开比赛，华北队获胜。华北队是从田径选手中挑选队员临时组成的。⁷⁷

该竞技项目引入圣约翰，是在 1912 年以后。

篮球在大学里正迅速受到欢迎。最近曾有不少热烈的班级对抗赛，混战中可见精湛球技。⁷⁸

但是，尝试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比赛简直是“斗牛”，而不是“篮球赛”。

1916 年，篮球再次被引进圣约翰。⁷⁹1916 年 4 月的《约翰声》记载，圣约翰早已与南洋进行过两场比赛；尽管引进不久，但正迅速博得人们喜爱。⁸⁰1917 年春，篮球被列入大学竞技对抗赛项目。⁸¹1919 年，圣约翰加入上海业余篮球联赛（Shanghai Amateur Basketball League）。⁸²

除上述外，经确认圣约翰曾经开展的竞技体育项目还有门球⁸³、自行车⁸⁴、高尔夫⁸⁵、排球（1915 年引进⁸⁶）、手球⁸⁷、旱冰⁸⁸、划艇⁸⁹、拳击⁹⁰、板球、曲棍球⁹¹等。

6. 竞技体育的组织化

1896 年，圣约翰组织起竞技运动俱乐部。该时期梦寐以求的，就是与校外队比赛。⁹²

1898 年，根据校长卜舫济的建议，成立了高年级和低年级的体育协会（Athletic Association），凡正馆学生皆可加入，年会费 1 元。当年夏天的主要活动是网球和棒球。体育协会由 5 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具体运作。1900 年 1 月 19 日召开的总会有 50 名会员出席，张锡良担任主席。会上选举新年度负责人，刁腓力、陈孚卿、吴清泰分别被选为会长、秘书

⁷⁵ 李辅材等著《中国篮球运动史》，武汉出版社，1991 年，第 8-9 页。

⁷⁶ Max J. Exner, *Report, 1908-1909; Report, 1913-1914*. 本文所谓“Report”，乃基督教青年会外国干事于每年度末即 9 月最后一天撰写的提交给设在纽约的国际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现藏于明尼苏达大学。下文仅记“Report”。

⁷⁷ 前引李辅材等著《中国篮球运动史》，第 12 页。

⁷⁸ T. W. Sung, “Basket Ball,” *SJE*, May, 1912.

⁷⁹ “Basket-ball,” *SJE*, March, 1916.

⁸⁰ V. K. Yang [杨文恺], “Basket-ball,” *SJE*, April, 1916.

⁸¹ V. K. Yang, “Basket Ball Matches,” *SJE*, March, 1917.

⁸² “Basketball,” *SJE*, January, 1920.

⁸³ “Athletic Club,” *SJE*, October 20, 1896.

⁸⁴ “Bicycle Ride across the Country,” *SJE*, February 20, 1900.

⁸⁵ “New Tennis Courts,” *SJE*, June, 1913.

⁸⁶ “Volley Ball,” *SJE*, December, 1915.

⁸⁷ “Hand-ball,” *SJE*, March, 1916.

⁸⁸ S. C. Kuo [郭先桂], “Roller-skating,” *SJE*, January, 1913.

⁸⁹ K. T. Tsoong, “Rowing,” *SJE*, December, 1914.

⁹⁰ “St. John’s Boxing Club,” *SJE*, November, 1919.

⁹¹ John Mo, *op. cit.*, p. 3.

⁹² “Athletic Club,” *SJE*, October 20, 1896.

和会计。⁹³1913年，竞技体育的运作体制大幅改变。在那之前，一名外国教员担任所有项目的教练。各项目的队长也往往是同一位优秀人物，而且还要负责管理工作。其结果，1912年几乎没能举行比赛，导致学生们对竞技体育的兴趣降低。卜舫济校长试图改变这种状态，于是，3名外国教员被聘为顾问，田径、网球、足球、棒球各项目皆设队长和干事各一人。体育协会各该年度负责人如表3。⁹⁴

表3 1913-1924年度圣约翰体育协会负责人一览表

	田径	网球	足球	棒球
顾问	Charles F. Remer	William S. Pott	William S. Pott	H. B. Barton
队长	韦宪章	徐逸民	Yoen Lien	杨锦辉
干事	朱文瑞	董选青	张石麟	林祖光

出处：SJE, October 1913.

1913-1914年度末制定了章程，圣约翰大学体育协会（St. John's University Athletic Association）正式成立。其负责人为，会长巴顿、副会长韦宪章、秘书朱文瑞、会计威廉·卜舫济（William S. A. Pott，卜舫济校长次子）、副会计董选青。执行委员会则由上述4人外加足球、网球、田径、棒球各队队长和干事，以及中学部四个班的代表各1名、教员代表1名组成。⁹⁵卜舫济提倡改革的背景是，华东大学校际体育协会（East 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于1913年成立后，开始定期举办校际对抗赛，而远东奥运会也定于1914年在上海举行。⁹⁶卜舫济认为，在竞技体育界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因陷入美国那样的胜利至上主义而迷失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⁹⁷实际上，在1912年11月3日举行的校内运动会上曾发生过“几件不愉快事件”，同年的高年级个人冠军也被取消。卜舫济指出，运动会低迷，除不少优秀选手毕业离校外，“没有健全的竞争”、“练习不足”等也是主要原因；今后要培养竞技体育精神、注意卫生、不能什么事都做、不可稍有成果就沾沾自喜而要持续不断地练习。⁹⁸

改革的另一意图，是在竞技体育方面给学生以更多自治的自由。⁹⁹学生们或许通过俱乐部的运作理解了民主主义的含义，¹⁰⁰1915年修正的章程规定，教员不能担任俱乐部负责人。其结果，1915-1916年度的负责人全部是学生，即会长杨锦辉、副会长徐逸民、秘书周曰庠、

⁹³ F. K. Woo, "Athletic Association," SJE, April 20, 1900. 只打网球的会费仅70分，可见网球很受喜爱。

⁹⁴ H. T. Wei [韋憲章], "Athletic Notes," SJE, October, 1913; C. F. Remer, "Editorial," SJE, December, 1920. 同年网球用具改为自备，或也与运作体制改变有关。

⁹⁵ Tsoong khau-thauh, "New Officers," SJE, April, 1914; "Constitution of St. John's University Athletic Association," SJE, April, 1914.

⁹⁶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远东运动会延至1915年春。Kenneth B. Young,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Olympics," SJE, October, 1914.

⁹⁷ F. L. H. P., "Editorial," SJE, April, 1914.

⁹⁸ A Member of the Cliosophic Club, "Autumn Home Sports, 1912," SJE, December, 1912.

⁹⁹ 其中心人物是威廉·卜舫济。W. K. Eu, "The General Athletic Association," SJE, October, 1917; Z. P. Daung, "The General Athletic Association," SJE, October, 1919.

¹⁰⁰ 美国人在菲律宾也曾尝试通过竞技体育培养民主主义所必需的素质。前引拙稿〈远东运动会与基督教青年会（極東選手権競技大会とYMCA）〉。

会计袁良初、副会计徐肇钧。¹⁰¹

1920年9月24日再次修改章程，使中学部各学年选出的代表共8人得以加入执行委员会；而各俱乐部的队长、干事依然是执行委员，不过没有投票权、不能担任负责人。¹⁰²在此之前，体育协会和学生的关系不融洽，学生们每年交纳4元体育费，但对其用途渐生埋怨。¹⁰³因为，随着校外比赛增加，体育费几乎都被用于校外比赛，越来越多的学生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好处；另外，对选手们享受各种待遇——早晨不出操、在特设食堂享用营养丰富的饭菜等——也甚为不满，¹⁰⁴于是对学校代表选手揶揄，称其为“专业选手”、“业余选手”，或者“不是绅士”。体育协会曾在《约翰声》刊载1920年3月20日的决算，公布会费用途，但未能消除不满。总之，1919年顾斐德纪念体育馆竣工，标志着体育事业作整体审视的时期已经到来。9月24日，经讨论决定体育协会专注于校外比赛，不再参与体育馆的活动、校内体育及娱乐。为更充分反映大多数学生的意见，还修订了体育协会负责人规定，此前以运动部为核心的运作方式被改变。¹⁰⁵如此，竞技体育就成为学校事业的一部分。

最后就体育协会公布的决算作一介绍。此类资料十分珍贵，可直接帮助我们了解协会的具体活动状况。¹⁰⁶决算分体育协会会计经手部分，和事务所经手部分。首先看体育协会部分。收入为300元，全部取自银行。支出方面，网球部21.55元、足球部132.62元、篮球部44.4元、棒球部10元、一般经费35.84元，计244.41元，结余55.59元。主要支出内容为交通费（含小费）、比赛时的餐饮、通信、人工（捡网球）、照相、球衣、文具等费。事务所收入948.57元，其中来自学生的930元（或为体育费），网球门票、旧物处理等18.57元。这其中支给体育协会会计300元，减去其剩余部分55.59元，收入总计作704.16元。支出方面，网球部34元、足球部196.2元、篮球部23.4元、田径部9.5元、棒球部15.39元、一般经费130.47元，计408.76元，结余295.4元。主要支出内容，购置球类等器具居多。有趣的是金牌支出9.5元、秒表13.8元、伤者透视费5元。

下面观察校外竞技体育的组织化。

随着竞技体育在教会学校日益活跃，校际赛事增多，成立协调和管理机构势在必行。

人们都承认，在西洋，奥林匹克（Olympic Games）和校际对抗赛使国家的不同地区结合得更紧密，并成功地向世界表明不应忽视身体锻炼。本地主要大学认识到其重要性，深感有其必要，遂有东吴大学、中西书院、南洋公学、圣约翰四大学代表四人，在我校召开第一次会议。¹⁰⁷

¹⁰¹ "Officers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of S. J. A. A.," *SJE*, October, 1915.

¹⁰² Zung Tsoong lung [唐增辉], "Change in A. A. Constitution," *SJE*, September, 1920; C. H. Tyau, "New Officers of the Athletic Association," *SJE*, October, 1920.

¹⁰³ 1918年对48名学生日常支出调查的结果显示，学生每年支出总额，含学费在内为480.36元元（1914年）和458.82元元（1917年）；体育方面花销平均为8.42元元，最多的20元元。C. F. Remer, "The Cost of Living at St. John's," *SJE*, June, 1918.另，前引熊月之等主编《圣约翰大学史》，第63页载有1909年至1938年间7年的学费一览，“运动会费”1909年、1911年为2元，1917-1919年为4元；“体操服装费”1909年为25元，1911年为20元，1916-1919年为16元。

¹⁰⁴ "Athletes Excused from Morning Drill," *SJE*, November, 1912;。前引苏公隽〈我所了解的圣约翰大学〉。

¹⁰⁵ C. F. R. [C. F. Remer], "Editorial," *SJE*, December, 1920.

¹⁰⁶ Tsung Ths-chien, "The Financial Report of St. John's University Athletic Association, September 6th, 1919 // February 6th, 1920," *SJE*, March, 1920.

¹⁰⁷ N. L. Nien, "Formation of the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SJE*, June 20, 1904. "Athletics at St. John's College," *SJE*, February 20, 1905. 记载此次会议召开的日期是4月3日。

IA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就此成立。第二次会议时, 选出东吴大学的司马德 (R.D.Smart) 为会长、南洋的胡诒谷为副会长、圣约翰的沃克 (Millidge P.Walker) 为秘书、中西书院的怀特塞德 (Joseph W. Whiteside) 为会计。¹⁰⁸司马德在范德堡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就读时曾是万能选手, 当时正在东吴大学普及竞技体育。¹⁰⁹唯一的中国人胡诒谷是圣约翰的毕业生, 在校时曾任《约翰声》编辑, 毕业后在南洋任英语教员。

此处就上述引文中的“奥林匹克”略作探讨。因为, 关于中国人何时开始知道有“奥林匹克”, 存在不同见解。据罗时铭整理, 最早提出该问题的是阮蔚村著《中国田径赛小史》(1933年), 书中称顾拜旦 (Pierre de Frédy, baron de Coubertin) 曾向李鸿章呼吁清国参加第一届奥林匹克。罗否定该1896年说, 以《中西教会报》庚子六月之“巴黎赛会, 各院安置与赛各物, 现将次告竣。每日入内观赛之人, 实繁有徒, 以故颇形拥挤云”为据, 采1900年说。¹¹⁰但是, 该段文字记述的显然是巴黎博览会 (巴黎奥林匹克是博览会的一部分) 的情景, 与奥林匹克无关。薛文婷批判罗的观点, 支持1907年说。¹¹¹此外还有1904年说, 其根据是《女子世界》的报道〈大运动会〉。但如罗所指出, 该报道与奥林匹克没有任何关系。另有冯玉龙说, 1904年的天津《大公报》曾提及“亚力必嬉 (olympic) 赛力会”, 即圣路易斯奥运会, 但根据不详。¹¹²总之, 《约翰声》载上述文字, 应是现在有关奥林匹克的最早资料。《约翰声》就1904年秋季运动会的获胜者还这样说, “尽管他们未被看作 (古希腊) 奥林匹克获胜者那样神圣, 但是……”。¹¹³

让我们回到正题。IAA 主办的第一次竞技运动会, 是1904年11月24日的田径运动会。¹¹⁴第二次是1905年11月9日在南洋, 第三次是1907年11月16日在东吴大学, 第四次是1908年5月14日在圣约翰, 第五次是1909年5月14日在东吴大学。¹¹⁵此外, IAA 主办的网球比赛始自1907年。¹¹⁶由于校际对抗运动会在1911年全面停止, 1909年的运动会也就成了最后一次。关于IAA为何解散, 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史温 (Alfred H. Swan) 说原因是“不和 (friction)”。¹¹⁷

1914年1月2日, 经基督教青年会倡议, 华东体育机构 (青年会、圣约翰、南洋、万国体育会 [Shanghai Recreation Club]、华童公学、育才公学、中西书院、远东体育

¹⁰⁸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SJE*, August 20, 1904.

¹⁰⁹ W. B. Nance, *op. cit.*, pp. 37–38.

¹¹⁰ 罗时铭著《奥运来到中国》,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2-22页。

¹¹¹ 薛文婷著《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史论 (1840-194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67-71页。薛采1907年说的根据是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审定《奥林匹克运动》(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2年)。但最早指出此一事实的是Wu Chih-kang, *op. cit.*, 其根据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机关杂志 *Tientsin Young Men*, VII, 12, May 23, 1908.

¹¹² 冯玉龙《〈大公报〉与近代中国体育研究》, 苏州大学硕士论文, 2006年3月。薛文婷称, 她检索《大公报》和《时报》, 但未见有冯所称之文 (前引薛文婷著《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史论 (1840-1949)》, 第69页)。笔者翻阅1904年的《大公报》, 也未见此文。

¹¹³ “Athletics at St. John’s College,” *SJE*, February 20, 1905.

¹¹⁴ 前引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 上卷, 第45页称, “中华大学联合运动会”第一次大会于1904年4月在苏州举行, 有误。

¹¹⁵ Y. Y. Tsu [朱友漁], “Intercollegiate Field and Track Meet,” *SJE*, December, 1905; “Intercollegiate Sports,” *SJE*, February, 1907; “Intercollegiate Field and Track Meet,” *SJE*, August 1908; “Intercollegiate Sports,” *SJE*, August, 1909.

¹¹⁶ Z. Z. Kwei, “The Inter-collegiate Tennis Tournament,” *SJE*, August, 1907.

¹¹⁷ Alfred H. Swan. *Report*, 1913–1914.

协会、东吴大学)的代表齐聚一堂,讨论成立 ECAF(East China Athletic Federation)。因为他们必须向预定 5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派出代表队。会上推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会长,东吴大学的司马德为副会长,远东体育协会的聂其炜(曾国藩外孙)为名誉会计,史温为名誉秘书。聂和史温都来自青年会,可以说该组织是青年会主导的。青年会致力于在上海等地推广竞技体育,但因不是教育机关,不能参加 IAA,为此甚为不满,于是欲借机掌握上海竞技体育界的主导权。

另一方面,司马德试图重新恢复 IAA 的组织,自 2 月就呼吁圣约翰、金陵大学、南洋、沪江大学、吴淞商船学校(校长萨镇冰,1915 年为海军部接收)、之江大学等举行联合运动会。联合运动会于 5 月 16 日在东吴大学举行,参加学校有南洋、金陵大学、圣约翰、之江大学和东吴大学。运动会前一天举行会议,决定成立 ECIAA(East 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汉译“华东六大学体育联合会”),除上述五校外,沪江大学也参加。¹¹⁸关于该组织的成立,史温不愿多说,但或有抵制青年会试图主导体育界的意图。ECAF 在远东大会结束后即不复存在,而 ACIAA 则在 1920 年又有复旦、东南二大学加入,发展为“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成为华东地区竞技体育的核心组织。¹¹⁹

7. 竞技体育设施

圣约翰校内运动会始自 1890 年,但关于其场所,《约翰声》没有任何记载。(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作“礼拜堂前”,想必是利用校内空旷地点举行。早期学生打棒球、足球、网球等,也应是在类似地点。黎宝骏说,1895 年曾在钟楼前空地建起网球场,但并无确切佐证。¹²⁰1899 年体育馆落成,学生们对此“倍感新奇”。¹²¹1902 年,经卜舛济努力,圣约翰借地 24 亩作运动场。¹²²1907 年,校友会(1900 年成立)捐资在苏州河对面修建了新运动场。¹²³1911 年,主要由校友会捐助,圣约翰购进位于其南部兆丰花园的部分土地(校园与极司非而路之间,约 70 亩),将其改建为训练场(drill)。此地除军事训练外,也用作高尔夫球场,但 1913 年起成为大学生专用的网球场。¹²⁴1915 年夏,又新修足球场和九面土质球场(或为网球场),翌年再增网球场三面,旧体育馆被改成手球场。¹²⁵1919 年 11 月 15 日,拥有最新设备的顾斐德纪念体育馆落成。该馆耗资约 5 万元,也主要由校友会捐助。¹²⁶

¹¹⁸ Alfred H. Swan, *Report, 1913-1914*; Ho, Gunsun [郝更生],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 pp. 177-185.

¹¹⁹ 不过,在大学以外及全国竞技体育方面,青年会依然拥有极大影响。

¹²⁰ 前引黎宝骏《圣约翰大学体育史略》。

¹²¹ “New Residence and the Gymnasium,” *SJE*, December 20, 1898; “Gymnasium,” *SJE*, February 20, 1899; “The Gymnasium,” *SJE*, April 20, 1899. 黎宝骏称 1897 年在后操场北侧建起了体育室, 有误。

¹²² “The New Play Ground,” *SJE*, June 20, 1902. 黎宝骏说, 1900 年在梵皇渡口借地建起了足球场, 应指此事。前引黎宝骏《圣约翰大学体育史略》。

¹²³ “The New Ground,” *SJE*, May 1907. 黎宝骏说, 1909 年, 校友会捐助 1 万元, 在苏州河北面购地 84 亩, 修建了正式足球场, 周围建有跑道。前引黎宝骏《圣约翰大学体育史略》。

¹²⁴ “New Land Acquired,” *SJE*, April, 1911; “New Tennis Courts,” *SJE*, June, 1913; Mary Lamberton, *op. cit.*, p. 71. 关于该操练场, 黎宝骏的记述, 除未提到网球场外, 基本与 *SJE* 一致。前引黎宝骏《圣约翰大学体育史略》。

¹²⁵ “Athletic Improvements,” *SJE*, September, 1915; “New Tennis Ground,” *SJE*, May, 1916; “New Handball Courts,” *SJE*, June, 1916.

¹²⁶ 前引熊月之等主编《圣约翰大学史》, 第 270 页。

II. 军事训练与竞技体育

1. 军事训练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记载，1883年“学校逐渐注重体育方面之设备，略购体育用具，并买假枪五十枝，为兵操之用”。该记述据称乃整理卜舫济校长口述而得，但1883年卜舫济尚未赴任，较之其他记述，可信度较低。但是，1883年曾爆发中法战争，校内很可能因此比较关心军事。不过，即使这种推测成立，后来的情况也表明，不久后就对兵式体操失去了兴趣。¹²⁷

1895年4月的《约翰声》有如下记述。

顾斐德 (Mr. F. C. Cooper) 曾做过六年义勇兵 (volunteer)，现在正对大学生和 (中学部) 三、四年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这是极好的运动，我们许多人都乐于参加。¹²⁸

1899年，顾斐德本人在谈到开展军事训练的经过时说，“我们利用甲午战争后学生中间兴起的对军事的热情，开始对某年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¹²⁹可见，甲午战争战败，曾经使圣约翰的学生非常关心军事。

1915年11月5日，圣约翰第一次举行营日 (Battalion Day) 时，被称为“圣约翰资格最老的候补士官 (cadet)” Mr. Mao 回顾了军事训练开始前后的情况，其内容载于《约翰声》。

几十年前，圣约翰还没有足球、棒球、网球，也没有任何其他运动。为了消遣 (sport) 和多少运动一下身体，Mao 和学友们每天一到下午就在小运动场集合，自己学习和进行训练 (drill)。他们用竹竿当步枪，用破布做成旗帜，更有趣的是敲汽油桶当战鼓。他们就这样喧闹着行进，铁皮鼓在校内敲得震天响。那是多么可笑的情景。Mao 说，圣约翰的军事训练就是这样开始的。而训练营的首任司令官不是别人，正是已故的顾斐德教授 (1915年去世)。¹³⁰

查1910年的同窗名单，Mao 姓仅 Mau Z Tsing (毛士俊) 一人。他当时是杭州仁和高等学堂的英语教员。Z-tsing 之名见于1896年秋季运动会，是二人绑腿跑、长跑和短跑冠军。

¹²⁷ 前引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组编、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 (1879-1952)》，第261页收有照片一帧，说明为“圣约翰书院的学生接受兵体操训练 (1893)”。此说明或为考虑到前页孙摩西 (1949年毕业于) 〈文体活动与校园文化〉中“1893年学校成立学生军”一段文字而加。但如后述，考虑到1895年顾斐德开始军事训练前，学生们训练时用的是竹竿、破布、汽油桶等，该照片显然属于更晚时期。另该照片还以“十九世纪末期，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接受兵式体操训练”的说明收于前引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体坛回眸卷》第61页、以“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接受兵式体操训练”为说明收于高翠编著《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页、以“洋务运动时期接受兵操训练的学生”为说明收于前引王华倬著《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第39页。再，前引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体育回眸卷》第61页还收有“洋务运动时期，身穿清兵服饰的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们在进行兵式体操训练 (摄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

¹²⁸ “Drill,” *SJE*, April 20, 1895. 此处所谓“义勇兵”，或指“万国商团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顾斐德1886年来华，加入 Volunteer，曾任 B 队中士。Mary Lamberton, *op. cit.*, p. 38.

¹²⁹ “Welcome,” *SJE*, April 20, 1895.

¹³⁰ Y. Z. Tseu [周曰庠], “The First Battalion Day,” *SJE*, November, 1915.

¹³¹据此推断，Mao 应该就是毛士俊。而毛的回忆则与顾斐德所说的“学生中间兴起的对军事的热情”不谋而合。

报道军事训练的同期《约翰声》还载有题为“The Life of a Soldier”的小论文，从中也可看出对军事的热情。¹³²该文开首说，“我国岂止不鼓励当兵，甚至蔑视当兵”，但“士兵的状况并非都不好，许多情况下是好的，不应蔑视，一般而言值得尊敬”。然后说，当兵的好处是，可以通过锻炼筋骨而更加强健，平时不生病，健康地生活，危机时能够自保；还说，士兵是国家的守护者、人民的抚慰者，值得尊敬和赞美，否定了对当兵的传统看法。同年8月的《约翰声》采用“中华帝国国章”龙盘绕着学校的图案作封面（图2）。¹³³可见，军事训练是在民族意识觉醒、高涨过程中由中国学生开始的，而学校当局对此采取了因势利导、善加利用的态度。



图2 新设计封面

（出处：SJE, February, 1907.）

同年夏，大学上下都在进行军事训练，还有哑铃和棒操运动。在枪支未齐备前暂用竹竿代替，还计划配发制服。¹³⁴同年12月正式成立了由四个连组成的营，配发了冬季制服。¹³⁵这支新成立的义勇军在1月23日的毕业典礼上展现了平日训练的成果。前来检阅的美国上尉称赞道，这是他所见过的接受西方训练的最优秀的中国军队。¹³⁶不久后入学的新生也开始接受军事教育。

每周二、四下午五时十五分至六时，中士对新生进行军事教育。有的感到新奇，也有的害羞。几乎所有人都从未以任何方式活动过身体，所以，训练他们是需要忍耐的工作。¹³⁷

¹³¹ I. C. Suez, "The Alumni Register," SJE, February, 1910; "Athletic Contests," SJE, December 20, 1896.

¹³² "The Life of a Soldier," SJE, April 20, 1895.

¹³³ F. L. H. P., "Editorial," SJE, August 20, 1895.

¹³⁴ "Drill," SJE, August 20, 1895.

¹³⁵ "St. John's College Volunteer Corps," SJE, December 20, 1895.

¹³⁶ "The Closing Exercises," SJE, April 20, 1897.

¹³⁷ "The Recruits," SJE, April 20, 1897.

顾斐德说，军事训练的意义在于培养“纪律性、准确性、组织性”。这都是国民不可或缺的素质，但却是中国人所欠缺的。¹³⁸但并非所有学生都理解这一点。下面的引文写于军事训练开始三年后。

我校开始军事训练以来，以有损学生体面之由，偏见及责难不断。……还有人怕我们成为叛逆，将来会颠覆中国政府而提出异议。这是致命错误。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叛逆中国，而是要成为能担当改革中国工作的人。¹³⁹

1903年入学的新生，从进入宿舍第二天起就接受了军事训练的洗礼。

早晨七点，他们被告知要去训练。帕尔默少校让人感到敬畏。他目光刺人，声若洪钟，吓得新生们打哆嗦。十分钟后，“重新集合”的号令响起，新兵特训班解散了。……一位少年大声说，“唉呀，手指冻僵了。这么冷，手指还不能缩进去。”另一少年答道，“脸一直仰着，脖子疼！”¹⁴⁰

帕尔默少校即1901年赴任的英语教员、美国人帕尔默（Giles B. Palmer），他接替顾斐德担任军事训练（改英国式为美国式）。¹⁴¹颜惠庆说，他在圣约翰教英语时，军事训练教官是佛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该教官或即帕尔默。¹⁴²他的严厉，无疑封杀了对军事训练的公开批判。1905年入学的学生在毕业时曾这样回忆帕尔默。

军事训练对我们来说是最痛苦的。对我们这样身体单薄的年轻人来说，手套也不戴、长袍也不穿地暴露在寒冷中，几乎是难以忍受的。特别是那年格外冷，但帕尔默少校对我们毫无怜悯，让我们使劲挺胸，直挺得肋骨疼。¹⁴³

1906年入学的学生也有几乎同样感想，可见军事训练对他们是多么苦不堪言。不过，从他们略带夸耀的语气中，又能看出他们经过考验、克服痛苦后所体会到的喜悦和自信（他们毕业时，帕尔默已不在圣约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圣约翰再次掀起军事热，有的外国教员还从了军。1916年，义勇军营得到加强。¹⁴⁴大战结束，眼见德国的军国主义（militarism）彻底，中国也有声音批判“军国民”主义。因为，清末民国初期的“兵式体操”与“军国民”主义密不可分。人们开始讨论兵式体操是否应该提倡和实施，长沙的雅礼学校在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1920年分别停止了

¹³⁸ F. C. Cooper, "Physical Training," *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Vol. 3, 1899.

¹³⁹ A. S. Yuan [袁杏生], "The Value of Military Drill in a School," *SJE*, June 20, 1898.

¹⁴⁰ Yau Kya-yi [姚家彝], "The History of the Class of 1910," *SJE*, August, 1910.

¹⁴¹ "Change in the Drill," *SJE*, April 20, 1901.

¹⁴² Hui-ch'ing Yen, *op. cit.*, p. 32.

¹⁴³ L. Y. Chiu [邱良荣], "History of Class, 1912," *SJE*, October, 1912.

¹⁴⁴ V. K. Yang, "Old Rule Restored," *SJE*, May, 1916.

兵式体操。¹⁴⁵圣约翰也不可能与此潮流无关。1920年1月的《约翰声》刊载的某论文，把“military preparedness”和“militarism”作了区分，并主张，将来难免有其他条顿人势力再次兴起，故在和平年代也必须做好战争准备。¹⁴⁶不过，圣约翰的义勇军营在同年秋被解散。¹⁴⁷但童子军被保留，三十名童子军队员在队长陈炳章、副队长潘蕃生和T. C. Waung的组织下继续开展活动。¹⁴⁸

童子军是英国人贝登堡（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 1st Baron Baden-Powell）在1908年创设的青少年组织，中国最早的童子军，据说是严家麟于1912年在武汉的文华书院组织的。上海也有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童子军活动，但中国人很少参加。1913年，华童公学校长康普（G. S. Foster Kemp）举办童子军教育会议，决定采用“中华童子军”的名称，并成立“中华童子军总会”。¹⁴⁹圣约翰则在1914年由诺顿（John Randall Norton）等人组织了童子军，并与青年会中学一同被承认为中国童子军第五队。¹⁵⁰1915年，华童公学、青年会中学、圣约翰大学及其中学部、沪江浸会大学等共组童子军，会员约400名，会长为钟文耀，副会长为萨镇冰和聂其杰。¹⁵¹1915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远东运动会，是他们初次亮相的舞台。童子军除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外，还和西方人童子军共同演习，相互切磋架桥、射箭、设营、测量、急救等技术。¹⁵²关于此时的名称“中华童子侦探队”，《约翰声》载有一文，颇值得关注。

153

当时，与其他国家童子军一样，中国的童子军也采用贝登堡的《童子军手册》（Scouting For Boys）中的誓词，即“童子军赞美他的王和国家（A scout honours his King and Country）”。¹⁵⁴可是，童子军运动的反对者出于误解而错误地报告称，童子军是试图复辟清朝的组织。此事发生在何时不详，但从上下文分析，应在袁世凯行帝政、张勋复辟等事件相继发生的1915至1917年间。童子军的许多队员因父母反对而退出，活动本身也被迫取消。于是，童子军“中华童子侦探队”的名称被改作“中华童子军”。该文强调说，童子军培养名誉、忠诚、爱国、服从等军事性美德，但与军国主义泾渭分明，并无意把少年变成军人或吸血鬼，是反战的（anti-war）。

实则，关于名称问题，1915年时就曾有过议论，彼时将“中华童子军”特意改作“中华童子侦探队”，是为了强调其与军事无关。会长钟文耀曾主张，童子军与政治和军事无关；童子军不是政治事业，而是社会事业，有助于形成好国民的人格。¹⁵⁵而现在却是“scout”的直译词“侦探”又引起误解，故重新使用“童子军”的名称。此过程表示，童子军运动的特点是试图与军国主义划

¹⁴⁵ 这两所学校都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雅礼学校（Yali Middle School）计170名学生中，有41名是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学生青年会调查表（1916年度）》，《青年进步》，第10册，1918年2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体育主任则是基督教青年会原体育干事麦克乐（Charles H. McCloy）。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干事晏士纳（Max J. Exner）早在1911年就已对以兵式体操为主的日本式体育进行批判（Max J. Exner, *Report*, 1910-1911.）。

¹⁴⁶ T. I. Zung [唐增辉], “Military Preparedness,” *SJE*, January, 1920.

¹⁴⁷ Zung Tsoong-iung, “Demobilization of the Battalion,” *SJE*, September, 1920.

¹⁴⁸ T. I. Zung, “St. John’s Boy Scout Troop,” *SJE*, October, 1920.

¹⁴⁹ 王晋丽《童子军在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8-14页。

¹⁵⁰ K. B. Young, “The Preparatory Interclass Meet,” *SJE*, June, 1914; K. T. Tsoong, “Boy Scouts,” *SJE*, December, 1914; K. T. Tsoong, “Boy Scouts Formed in Extension School,” *SJE*, May, 1915.

¹⁵¹ 《童子军侦探队之说明》，《进步杂志》，第8卷第3期，1915年6月。

¹⁵² 《纪事二》，前引《进步杂志》，第8卷第3期。

¹⁵³ A Medico, “The Boy Scout Movement,” *SJE*, October, 1917.

¹⁵⁴ 贝登堡的原誓词是“I will do my duty to God and the King（我将为国家和上帝尽我的义务）”。不过，各国所用誓词稍有差异。

¹⁵⁵ 《童子军侦探队之颂词》，《进步杂志》，前引《进步杂志》，第8卷第3期。

清界线。正因如此，童子军运动在军事训练被废止后仍得以延续。

2. 体育

无论怎么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教会学校以西方人作教官大搞军事训练而不受干涉，以现在眼光衡量也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即使在西方，学校作为课业而上“体育”也是崭新概念，其内容究竟应该如何，并无明确共识。英国学校开始进行训练可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1870年制定初等教育法后，政府鼓励学校引进军事训练，至1890年代，军事训练是“体育”课的一般内容。而在私立学校（public school）盛行的则是竞技体育。¹⁵⁶

在美国，学校开始以“体育”作为课业，始于1860年辛西纳提（Cincinnati）引进德国式体操，其后主要是中西部城市纷纷效仿，但并非必修课业。1866年，加利福尼亚州以法律形式规定中学必须上“体育”（其次是俄亥俄州于1892年仿行）。19世纪后半期，各地设立培养体操教师的师范学校。另一方面，根据1862年制定的莫雷尔法（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 Act，即“土地拨赠法案”）成立的大学则对学生课以军事训练。德国式体操、瑞典式体操（1880年代以后）都含有军事目的和内容，其与军事训练的界线并不明确。1885年成立的美国体育振兴协会主要推进以体操为主的“体育”，反对军事训练及球技；但究竟应采用哪种体操，却并没有给出最终结论。进入20世纪，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要素之一而渐次普及开来，其核心人物是古利克（Luther Halsey Gulick）和班克罗夫特（Jesse Bancroft）。而杜威（John Dewey）等人的教育论——重视游戏（play）的作用，课业必须有吸引力——也对“新体育”的确立发挥过重要作用。¹⁵⁷这种新的体育思想也为中国所接受，从而成为兵式体操争论的导火索。

在本文探讨的截止1920年的时期内，圣约翰并没有“体育”必修课。¹⁵⁸但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参加早体操和军事训练。下面依时间顺序观察体操和军事训练的事实状况。

1890年代后半期，所有学生皆须参加的训练中，含有哑铃和持枪训练。开始是任意参加，但不久后即列入大学的正式课程。学生每周接受两次训练指导，并被鼓励做游戏或进行竞技项目训练，以备参加每年两次的运动会。其目的，军事训练为培养纪律性、准确性、组织性，哑铃为活动周身肌肉以使体格匀称，棒操则为锻炼上身。¹⁵⁹训练初时全部由顾斐德担任，1898库珀（George W. Cooper）到任后，顾斐德担任军事训练，而库珀担任体操训练。¹⁶⁰

1900年代，圣约翰已在38英亩土地上建成八座建筑物、两个运动场和一个体育馆，拥有18名教师和350学生。身体训练方面既没有明确系统，也未配置体育指导员（Physical Director），全赖特定教员自发从事。军事训练和徒手体操（calisthenics）是强制参加，网球、足

¹⁵⁶ Alan Penn, *Targeting Schools: Drill, Militarism and Imperialism*, Woburn Press, 1999; J. A. Mangan and Hamad S. Ndee, "Military Drill Rather More Than 'Brief and Basic,'" *English Elementary Schools and English Militarism*, in J. A. Mangan ed., *Militarism, Sport, Europe: War without Weapons*, Frank Cass, 2003.

¹⁵⁷ Richard A. Swanson, Betty Spears,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wn & Benchmark, 1995, fourth edition; 榊原浩晃〈英国初等教育草创期Mathias Roth引进体育课业的提议（イギリス初等教育草創期におけるMathias Rothの体育授業導入提案）〉，《福岡教育大学纪要》，第5分册，第55号，2006年；小田切毅一〈美国体育振兴协会中的体育活动家们：体育专职成立的历史性序幕（アメリカ体育振興協会に参集した体育家たち：体育専門職成立の歴史の幕開けを振り返る）〉，《体育学研究》，第55卷第2号，2010年12月等。

¹⁵⁸ 因此，称圣约翰是“国内最早推进系统的体育教育的大学”欠妥。杨禾丰〈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生活及其变迁（1920-1937）〉，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¹⁵⁹ F. C. Cooper, *op. cit.*

¹⁶⁰ F. C. Dzung, "Physical Exercise by Mr. Geo. Cooper," *SJE*, December 20, 1898.

球、棒球、田径等竞技项目则作为娱乐自由进行。徒手体操除周日外每天从早晨7时15分开始训练15分钟，军事训练则在周一、三、五进行。军事训练适用美国陆军步兵规则，要求参加者绝对服从命令、尊重长官。曾有学生模仿队长发令，被即刻勒令退学。无正当理由不参加会被扣分，每扣一分，则被罚周六下午在教室里静坐30分钟，扣分达50分须留级。¹⁶¹军事训练使学生养成服从、行动迅速的习惯和勇敢、刚毅的品质，竞技体育则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大学精神。¹⁶²担任军事训练的，1901至1906年为帕尔默，1907年以后是施达格（George Nye Steiger）。施达格也是上海万国商团成员。

至迟于1913年，圣约翰新置体育指导员职位，由施达格充任。1913年施达格因休假暂时回国，桑福德（Edgar L. Sanford）继任。1917年，大学四年级学生杨锦辉被任命为体育副指导员，以襄助桑福德。1919年，桑福德休假临时回国，大学刚毕业的沈嗣良被任命为中国体育指导员（兼任童子军队长），这是就任该职的首位中国人。翌年，沈留学美国，Z. D. Wong继任。

1916至1921年就读于圣约翰的苏公隽回忆冬季体操训练时说，苏州河对岸的运动场没有遮蔽物，北风吹来，寒风彻骨，但又不允许学生穿厚棉装，被学生视作“虐政”。偷懒一次罚1分，连续两次就罚2分，三次连续不参加罚4分，罚到25分就可能被勒令退学。不过，学生们也有办法，隔天逃一次，就可以罚不到25分而度过最寒冷的时期。军事训练每周一、三、五下午4时开始，周五检阅。所有训练都是美国式，由美国教员指挥，号令全都使用英语，仿佛就是美国军队。¹⁶³

1910年代后半期加强了健康管理。在此之前，对中学部和大学插班新生一直实施医学检查，自1918-1919年度开始对中学部和大学一年级所有学生作医学检查和身体检查。¹⁶⁴表4为该年度医学检查结果。

表4 1918-1919年度医学检验报告

	大学一年级(77名)	中学部(240名)	合计(317名)
沙眼、眼睑炎症	43.00%	25.40%	29.00%
耳垢	15.50%	35.45%	30.60%
牙病	32.50%	24.25%	26.20%
心脏	9.60%	8.35%	8.80%
肺	11.70%	1.35%	3.80%
疝气	0.00%	0.80%	0.60%
包茎	6.50%	10.00%	9.20%
脊柱弯曲	3.90%	1.30%	1.90%
脚气	3.90%	12.90%	10.70%
需预防接种者	62.30%	59.60%	60.20%

出处：SJE, November, 1918.

¹⁶¹ John Mo, *op. cit.*, pp. 11-12.

¹⁶² K. C. Tsha, "The Chinese Studen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SJE, December, 1907.

¹⁶³ 前引苏公隽〈我所了解的圣约翰大学〉。

¹⁶⁴ E. L. Sanford, "Fall Report on Physical Training," SJE, November, 1918.

除表 4 外，据说学生患腹股沟淋巴结肿大、鼻塞、扁桃体肿大的非常多。心脏发现异常的几名同学获准不再参加军事训练，所有学生也无需再进行剧烈运动。其中有两名学校代表选手，也被取消了代表资格。表中可见大学生多染肺部疾患，其中一名或被诊断为结核，为集中治疗而离开了学校。马约翰曾说，中国人全都换上了脊柱弯曲症，¹⁶⁵实际上只有 1.9%。

体检测定项目为身高、体重、胸围等，以此为据算出身体强壮度的皮尼埃指数（身高减去最大吸气时胸围和体重）。该指数越低，则体格越强壮，平均为 20-25，30 以上则为虚弱。从表 5 看，指数整体非常高，亦即学生体质普遍非常弱。不过，桑福德对此有所保留，认为西方人的标准对中国人不见得合适。

表 5 各年龄组的皮尼埃指数

年龄	体重 (kg)	身高 (cm)	皮尼埃指数
16	47.0	163.0	43.9
17	49.1	164.7	41.2
18	50.6	164.3	37.8
19	50.6	165.6	39.1

出处: *SJE*, November, 1918.

中学部自前一年开始要求所有学生每周进行强制运动两小时（北京的清华学校在 1913 年即已实行“强迫运动”¹⁶⁶）。强制运动几乎无人逃避，学生们都以属于某强制运动队而感到自豪。表 6 所示为运动种类及其参加学生数。

表 6 强制运动一览表

种类	人数
越野赛	54
足球（选手除外）	55
足球（无经验者）	8
棒操	31
网球	71
田径	24
竞走	5

出处: *SJE*, March, 1920.

1919 年底的体检数据显示，中学部的该尝试效果极佳。由于认为中学部的学生自己不懂健康管理，¹⁶⁷体育指导者也主要把精力放在这方面。不过，沈嗣良认为，这种尝试大学也应该实施。沈的意见在他赴美后得到实现。¹⁶⁸

¹⁶⁵ John Mo, *op. cit.*, pp. 7-8.

¹⁶⁶ 叶宏开等编《挺起胸来：清华大学百年体育回顾（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1 页。

¹⁶⁷ W. Z. L. Sung [沈嗣良], "Report on Physical Training," *SJE*, March, 1920.

¹⁶⁸ *Ibid.*

III. 国旗事件与体育政治化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上海的所有学校都被卷入政治漩涡。圣约翰也有风波发生，但校园生活基本上保持平静。纪律严格，同时运作体现出民主，使学生的不满情绪得到释放。这是一种极其巧妙的统治。1922年的非基运动对圣约翰也没有什么影响。一名学生在1922年写道，“我们对竞技运动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十分理解罗斯福的忠告是十分健全的，那就是好好学习、好好运动”。¹⁶⁹圣约翰不同于外部世界，这里的学生喜爱竞技体育，既不需要“军国民”主义，也不需要民主主义。然而，这种乐天的竞技体育观，不久后即被迫改变。

1925年5月30日发生的五卅事件，再次把上海的学校投入政治漩涡。在圣约翰，激进的学生会成立，取代了此前的学生自治会，并要求学校停课。经过一番曲折交涉，学校方面同意停课。6月2日夜，童子军副队长潘志杰要求卜舫济校长升起中国国旗。卜舫济未作明确答复，潘认为是默许。第二天，校内半悬中国国旗。上海教区主教郭斐蔚（Frederick Rogers Graves）要求卜舫济降下，卜舫济于是让职员取下了中国国旗。卜舫济以从未有过的严厉态度面对学生，并决定关闭学校。学生们则离开学校，并发誓永不返回。结果大学约60%、中学部几乎全部共553名学生离开学校，重新成立了光华大学。

杨禾丰认为，“国旗事件”一直被称作反对文化侵略的反帝运动，被迫退学的学生也被描述成革命英雄；但事实并非如此，真相似乎是，受五卅时期政治环境影响，卜舫济和学生的对立被革命语言所涂饰。学生们为表明自己的立场正确而故意歪曲事实，坚称卜舫济撕坏了中国国旗，侮辱了中国。学校做了解释，但当时反帝形势高涨，圣约翰于是成了最好的攻击目标¹⁷⁰。

同年9月，光华大学开学。南洋也开始了新学期，全体学生投票决定，要求取消圣约翰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会员资格。随后征集其他六大学的意见，获得一致同意，遂于10月2日向联合会正式提出要求。南洋的态度十分强硬，威胁说如果不取消圣约翰的资格，南洋将主动退出。¹⁷¹

当时体育联合会会长是圣约翰的沈嗣良。沈接到提案后，于10月5日在四川路青年会会馆召集临时会议，各大学的职员和学生代表前来参加。主持会议的本应是沈嗣良，但沈因是当事方予以回避，遂由副会长、金陵大学的张信孚代为主持。朗读南洋的提案后，各方陈述意见。东吴大学的代表主张，会员资格，必须在破坏联合会规则或违反竞技体育原则时才能予以停止。金陵大学的代表说，决不能把政治带进体育。东南大学代表提议给予圣约翰停止活动一年的处分。学生们多站在南洋一方。圣约翰的代表散发了运动部的意见书，主张必须区别对待体育和政治，停止会员资格不合理。金陵大学代表鉴于事情重大，建议代表各自回校，待征得全体同意后再行票决。如此，结论被推迟一周。¹⁷²

一周后，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书记纳什（Willard L. Nash）公布投票结果是，赞成6

¹⁶⁹ Wen-Hsin Yeh, *op. cit.*, p. 72.

¹⁷⁰ 杨禾丰〈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生活及其变迁〉。

¹⁷¹ 《民国日报》，1925年10月4日。

¹⁷² 《申报》，1925年10月6日。

票，反对 8 票，南洋的提案被否决。¹⁷³10 月 14 日，南阳宣布脱离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其宣言书称，在五卅事件中，圣约翰学生受良心驱使起而救国，但学校当局却压制他们，并侮辱中国国旗，口称维护人道的外国人的画皮已被撕下。列强的“顺民养成所”教会学校坚决反抗，这还是第一次。有意见说，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是体育机关，不应带入政治外交问题；然而，体育和智育应建立在人格基础上，体育的规则无不以道德、人格为其基础，没有人格就没有体育。圣约翰的外国教员侮辱我国旗，压制青年的爱国运动，这是对国格、人格的最大侮辱。还有人说。南洋的提案是为了破坏体育会组织，但我们怎能再在外国人指使下丧失民族精神。¹⁷⁴

10 月 16 日，复旦大学响应南洋的呼吁宣布退出。而圣约翰方面也自请停止活动一年。公开理由是，和对立学校比赛容易发生不测事态。¹⁷⁵

1926 年 3 月 13 日，南洋、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的代表集议，决定成立江南大学体育协会（Kiangnan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并自 17 日举行了篮球锦标赛。协会选复旦大学的郭任远任会长、光华大学的容启兆为副会长。4 月召开的执行委员会接纳持志大学和中国公学加入。¹⁷⁶后来又有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相继加入，从而成为地区最大的体育组织。而华东大学体育协会则停止了实际活动，最终于 1929 年解散。¹⁷⁷就这样，一直引领上海竞技体育界的圣约翰失去了其活动舞台。

五卅运动引发的上海竞技体育界重组，实际上不过是更巨大潮流中的浪花之一。1923 年曾在大阪召开第六届远东大会。在其开幕式上，原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格雷（John H.Gray）代表中国致词。但是，在日华侨听说后非常重视，并拥立了中国代表。该事件后，体育界的主权争夺战就拉开了序幕。1924 年，格雷等人筹备的全国运动会招致反对运动，其运作最后转到中国人之手。1924 年 7 月，中国人为主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以取代基督教青年会主导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1922 年成立）。这些动向的背景就是非基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五卅运动等高潮迭起的民族主义思潮。¹⁷⁸体育和政治无关的主张已不可能为人接受，而用英语议论南洋的爱国主张是否正确，也不过是滑稽剧而已。

IV. 结 语

圣约翰何以在中国最早举行运动会，并在早期竞技体育界发挥主导作用？有山辉雄在解释棒球在日本高等教育机关得以普及的理由时说，“运动之成立，必须具备脱离日常环境、其自身即可自我完善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在明治社会，能够提供此类特权性时间和空间以支撑这种人工运动成立的，就是大学预备校、第一高级中学等高等教育机关”。¹⁷⁹在中国，同样的

¹⁷³ 《申报》，1925 年 10 月 14 日。

¹⁷⁴ 《民国日报》，1925 年 10 月 16 日。

¹⁷⁵ 《申报》，1925 年 10 月 17 日。《时报》，1925 年 10 月 19 日。

¹⁷⁶ 《申报》，1926 年 3 月 14、18 日，4 月 1、17 日。

¹⁷⁷ 1935 年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退出，1936 年改称上海大学体育协会。但因各大学间意见对立，未能开展活动，后来就进入战争时期。前引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体育志》，第 114-15 页。

¹⁷⁸ 前引抽稿〈远东运动会与基督教青年会（極東選手権競技大会とYMCA）〉。拙著《日本帝国与竞技体育（帝国日本とスポーツ）》，塙书房，2012 年，第 19-23 页。

¹⁷⁹ 有山辉雄著《甲子园棒球和日本人：媒体与竞技（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メディアのつくったイベント）》，吉川弘文馆，1997 年，第 20 页。第一高级中学于 1894 年改称第一高等学校。

场所只能是教会学校。圣约翰在行政、地理、语言各方面都游离于一般中国社会。正因如此，才成功地移植了竞技体育这种中国人完全生疏的未知身体文化。

那么，为何是圣约翰而不是其他教会学校？如前稿所指出，其原因在于圣约翰以西化而非以基督教化为优先，从而最早引进了英语教育。竞技体育是校园西化之一环，学校方面对校内开展竞技体育十分积极。¹⁸⁰这与日本的学校体育自治性发展形成对比。

通过这种形式引进的竞技体育获得发展，有如下原因。首先，在竞技体育引进校园时，创办了旨在促进英语学习的英文校内杂志《约翰声》。竞技体育和媒体的密切关系已无需赘言。其次，学校提供设施及器具，积极鼓励竞技体育。其三，学校拥有优秀的竞技体育指导人才。其四，先于其他学校成立的校友会也以各种形式支持竞技体育的发展，¹⁸¹竞技体育成为维系在校生和毕业生的纽带，提高了学生对学校的自豪感。其五，作为竞争对手，南洋的作用不可小视。考虑到剑桥和牛津、哈佛和耶鲁、早稻田和庆应等曾通过对抗赛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南洋之于圣约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圣约翰的竞技体育就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获得发展的。早期的运动会不过是在校内空地上举行的娱乐而已，随后走上了正规化、竞技化道路，不久后又与远东运动会发生联系。圣约翰最吸引人的项目是网球和足球。作为观赏项目，足球具有其他项目不可比拟的巨大影响。不过，尽管美国教员不断努力，棒球项目却并未在圣约翰扎下根来。可见，选择项目的主体是学生而非学校。当然，校园以外的环境也是原因之一，学生们在校外找不到相互切磋的对手。

学生们在远离中国社会的空间内接受、发展了竞技体育，但试图使竞技体育中国化的努力却被忽视。在日本，竞技体育精神被改造成武士道，但在中国，甚至连翻译竞技体育精神的词语都不稳定。在体育界，主导权在外国人手中，公用语是英语。圣约翰的竞技体育与学校本身一样，越来越走向“贵族”化，能够享受“好好学习、好好运动”特权的，只是中国人当中的极少部分。1920年代，在民族主义潮流高涨形势下，圣约翰成为替罪羊绝非偶然。因为，圣约翰游离于中国社会的距离太远。

不过，《约翰声》所反映的仅是圣约翰的一个侧面，却也是事实。该杂志的编辑方针一直深受校长卜舛济的影响，而他对民族主义始终抱有危机感。其结果，《约翰声》决不主张激进的民族主义。在报道与东亚同文书院的棒球比赛时，圣约翰方面的记述看似极为克制，但东亚同文书院方面的记述则反映出，圣约翰的学生似也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1925年的国旗事件导致绝大部分学生退学而离开校园绝非偶然的突发事件，不过是此前所积累矛盾的集中爆发而已。

至于圣约翰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竞技体育，尚需与中国其他地区、其他学校乃至女性、学生以外的其他人群的竞技体育状况进行比较，将圣约翰的经历、经验置于更大背景中予以观察。甚至还需在此基础上与日本、菲律宾等进行比较，才能明确中国的经历、经验所具有的意义。因此，对圣约翰竞技体育的研究，不仅对竞技体育史，而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也会有其贡献。而这正是笔者今后的研究课题。

¹⁸⁰ 前引拙稿〈“东亚病夫”与体育：从殖民地文化中的男性社会特征的角度观之〉。

¹⁸¹ 有关校友会，请参阅前引杨禾丰〈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生活及其变迁〉，第5章。